

○项祖华

国乐瑰宝 璀璨夺目

——纪念吕文成诞辰 105 周年

中图分类号:J603 文献标识码:E 文章编号:1002-9923(2004)01-0097-02

十九世纪末叶,华夏大地诞生了三大二胡宗师与国乐大家。他们是出生江苏的民间音乐家阿炳(1893~1950年)、国乐教育家刘天华(1895~1932年)和出生在广东的民族音乐家吕文成(1898~1981年)。他们都是二胡大师,同时也是熟谙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家和留下许多经典佳品的作曲家;也是传承发展、开拓创新、匠心独运、自成乐派的国乐大家。阿炳是浪迹江南、饱经沧桑的著名民间艺人;刘天华是使国乐从民间状态走向近代专业化道路的“学院派”杰出宗师,可惜英才早逝,壮志难酬;吕文成则是首创高胡,并使其成为广东音乐主奏与独奏乐器的第一人。他集演奏、演唱、作曲、乐改于一身,并且是“演艺圈”灌片最多的粤乐大家。刘天华、阿炳、吕文成是二十世纪胡琴艺术的奠基者和开拓者,是国乐界的瑰宝和名星。

值此吕文成先生诞辰 105 周年之际,粤乐高胡第三代传人、演奏家余其伟希望我撰文缅怀与纪念。吕先生幼年随父旅居上海,他曾回忆说:“我少年期间开始对音乐艺术发生难以解释的特殊爱好,尤其是对中国音乐。因此我选择了二胡及扬琴作为终身的音乐伴侣。”“五四”运动爆发,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,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先后出现了一些音乐社团,吕氏参加了 1919 年创办的上海“中华音乐会”粤乐组演奏、演唱活动。1917 年上海最早组成了第一个丝竹乐社团“文明雅集”,“清平集”、“钧天集”、“雅歌集”等相继成立;当时在上海城隍庙举行首次各地丝竹高手的空前盛会,随后 1920 年“大同乐会”、“国乐研究社”、广东音乐社团等也相继成立,把上海的国乐推向一个普及而鼎盛的阶段。吕氏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成长。当时在诸多国乐社团之间,惯用“清客串”的雅集方式,借此让各乐师之间和各乐种流派之间得以互相交流。我少年时师从的江南丝竹扬琴泰斗任晦初先生,1917

年在上海创办的丝竹乐社“清平集”,就云集了汪昱庭、李廷松、王巽之等国乐名家。任老曾最早将江南丝竹《三六》与《中花六板》改编为扬琴独奏并在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,他和吕文成先生笃谊甚深,经常切磋交流。广东音乐的创作与演奏,也从江南丝竹中吸收借鉴,这是和任老的传播媒介分不开的。同样吕先生也将《三六》、《欢乐歌》、《霓裳曲》丝竹乐曲引进广东音乐曲目,他还用扬琴独奏《三六板》和《汉宫秋月》两曲。吕先生的代表作品《平湖秋月》,便取材于杭州西湖的著名景观,并由此而命名,同时受益于江南丝竹乐曲《中花六板》的启发,借鉴了该曲的内在元素,加以变化发展而成,取得异曲同工之妙,成为粤乐高胡的经典杰作。吕先生风华正茂时期,在上海、香港、广州等城市进行表演、创作等艺术活动,他坚持立足传统,敢于吸收融合各地民间、戏曲音乐和西洋音乐的长处,兼容并蓄、厚积薄发,开拓创新。吕先生毕生致力创作的广东音乐粤曲、方言歌曲不下二百余首。题材广泛,结构严谨,旋律优美流畅、绮丽柔婉,节奏生动活泼、清新明快,韵味浓郁隽永、风雅潇洒。他创作了大量写景抒情、悦乐和美的乐曲,如《平湖秋月》、《蕉石鸣琴》、《满园春色》、《月影寒梅》、《风动帘铃》、《渔歌晚唱》、《烛影摇红》、《青梅竹马》;有催人奋进、乐观向上的《岐山凤》、《步步高》、《银河会》、《下山虎》;有反映民族觉醒、爱国精神的《醒狮》、《恨东皇》、《泣长城》、《送征人》、《齐破阵》等一批乐曲。他的作品堪称优质高产、百听不厌、脍炙人口、雅俗共赏、流传不衰。

深厚的自豪感和民族精神,是吕先生爱国思想的重要表现。他到香港定居后,生活遇到困难。正逢发生在三十年代前后的三江水灾,为了赈济内地的灾民,吕先生满腔热

(下转第 125 页)

收稿日期:2003-09-29

作者简介:项祖华(1934—),男,为国际扬琴学会 CWA 副主席,中国音乐学院教授,中国扬琴研究会会长。

《音乐批评杂谈》1960 年

讨论……,它是活跃音乐艺术生活、帮助读者了解音乐的主要方法之一,也是音乐艺术战线上的斗争方法之一。我们反对冒冒失失地乱批评,所引以爲憾的是精湛的批评不多,而并不是一般地厌恶批评,也不是主张批评越少就能解决音乐繁荣的问题,克服批评上的简单、粗暴的现象。有时恰恰相反,好的批评,敢于坚持真理的批评多一些,对大家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音乐和演出是有帮助的,对确保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和不走得太窄,也是有益的。

其次,我们要求音乐批评,提高水平,不乱不滥,要多多研究,要实事求是,要慎重,要避免偏激,要关心作家和演出者的辛劳和疾苦,并且,对音乐批评比之对音乐创作、演出的要求更要严格,这也是对的。但是,我们也要同时看到,音乐批评战线,也有自己的实际,队伍不大,而且都是业余性质,它的成长,也有一定的过程。而且,要使音乐批评逐渐提高,解决音乐批评中的简单、粗暴、贫乏、偏激的问题,一方面要多演,一方面要活跃争鸣,要敢于对不够准确的批评提出意见,甚至先要有便于使人能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气候、度量,同时能推心置腹,相互探讨、充实,才能便于发扬真理,减少简单、粗暴。

我们翻看音乐历史,也可以看到这一真理,如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过程中,出现了像舒曼、李斯特这些音乐批评者,展开对芬克、莫捷维乌斯等人的论争。俄罗斯音乐的兴起,出现了以巴拉基列夫为首的“五人团”的音乐批评,回击了当时宫廷音乐家的诽谤,才使音乐向更宽阔的道路上发展。

“少”在表面上可以减少一些简单、混乱的现象,多读书,可能获得一些比较周全的看法,但是不通过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,大力扶植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批评生长,也很难使得音乐批评能健康地发展。

我认为理论工作者,不应脱离实际,脱离实践去拟定一种一成不变的风格,要求去套一切东西,而应该鼓励一切作家,大胆实践,多方探索,即使在中国歌剧舞剧院这样具体的艺术团体,也应让百花开得万紫千红、千姿万态,共同为缔造民族的新歌剧而努力。

《是不是走错了道》1979 年 9 月

有些人,严格入骨,惜墨如金,对青年的创作和表演不肯轻易说句好话,那只能随他的便了。但是,事实上不管你怎样,绝对客观是不存在的,总是有倾向性的,有所强调的。绝对准确也是办不到的。对于新生的东西,只要是实事求是,又能从实际出发,就不必过分谨慎。特别是音乐艺术近十多年来,经过江青一伙的破坏,许多问题被弄乱了,创作演出水平大大降低了,民族音乐事业,如民族乐队、民族唱法等等,搁了许多年,都不准接触,西洋方法的行业,也被践踏得不成样子。作家还需要一个生活过程和解放思想的过程,因此对于新作、表演,还是应以鼓励为主,尽量多作一些关心和介绍的工作。

《从佛莱希的评论说起》1978 年 8 月

常见有些貌似公正的人,口口声声要求人家“公平”,指责人家不“公正”,想人家不说一句不同的话,其实他自己先把一只脚偷偷踏在另一个称盘上,这样量出来的数据哪里能够“公平”呢?

我想,最公平的办法,就是百家争鸣,用事实,用数据来说理,而不是悬空的什么“就是所谓有识之士也在所不免”来搪塞过去。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战术而已。

《关于批评》1983 年 7 月

(上接第 97 页)

诚地参加了粤港发起的赈济募捐义演,把全部演出所得款项,义捐给灾区和医院救济用。这些行为,真正体现了他的爱国热忱和对危难中的人民大众的高尚情怀。

先兄项祖英和我在五十年代起曾在上海民族乐团、上海音乐学院从事二胡、扬琴演奏、教学工作,回忆少年时从师学艺,我俩都一起学习二胡、扬琴,爱好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。当时新月、高亭、百代、胜利等唱片公司灌制发行了大量广东音乐唱片,还出版了不少粤乐曲集。其中吕先生演奏、演唱、创作录制的唱片达 270 余张之多,吕文成的鼎鼎大名,就成了我俩崇敬的偶像,他的二胡、扬琴演奏的唱片,就成为我们学习广东音乐最好的老师与教材。

刘天华先生生前曾于 1931 年在高亭公司灌片二张:二胡曲《病中吟》、《空山鸟语》及琵琶曲二首;阿炳先生于 1950

年,幸存钢丝录音而翻制的唱片有三张:二胡曲《二泉映月》、《听松》、《寒春风曲》及琵琶曲三首。二十世纪三大国乐宗师留存原创演奏的唱片音响,真是难得可贵,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是国乐界宝贵的经典精品和曲库文献,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和丰厚的艺术魅力。

上个世纪初,严老烈、丘鹤俦、何柳堂、吕文成、何大傻、陈德钜等都是广东音乐资深前辈演奏家、作曲家,其中首推吕文成更是集演奏、演唱、作曲、乐改于一身的佼佼者;他们开创建构了广东音乐发展史的新阶段、新风格与新篇章;他们的光辉业绩,将永载史册,与世长存。

粤乐代代薪传,更显流光溢彩。

琴韵悠悠高扬,喜见英才辈出。

2003 年 9 月 29 日